

从陶酒器视角探析早期社会复杂化之路

黄松松

南京大学考古文博与中华文明学院, 江苏 苏州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1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2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22日

摘要

社会复杂化是人类文明起源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而陶酒器作为早期社会的重要物质遗存, 由于其不仅与仪式活动更与剩余产品的支配存在密切的关系, 使其成为了窥见早期社会权力结构演变的一个重要窗口。因此, 本文以陶酒器的演变为线索, 探讨其在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从而引发关于“竞争性宴饮”与“剩余与仪式”两种理论的讨论。本文尝试将“竞争性宴饮”与“剩余与仪式”两种理论整合为一个嵌套的分析模型, 以陶酒器作为载体, 揭示经济剩余、仪式权力与竞争策略三者之间是如何共同推动早期社会的复杂化。研究表明, 陶酒器的演变经历了一个从功能分化到礼仪化的过程。通过对这两种理论进行比较, 也揭示了: 器物不仅是社会关系的被动反映, 更是社会关系得以形成的主动介质。陶酒器的形态与功能演变, 是经济剩余积累、仪式权力运作与竞争性宴饮策略相互作用的结果, 是早期社会复杂化的重要物质见证。

关键词

陶酒器, 竞争性宴饮, 剩余与仪式, 社会复杂化, 整合分析框架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ttery Wine Vessels: Exploring the Path to Early Social Complexity

Songsong Huang

School of Archaeology, Museology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Received: April 13, 2026; accepted: April 29, 2026; published: July 22, 2026

Abstract

Social complexity is a key topic in research on the origins of human civilization. As an important material remnant of early societies, pottery wine vessels—due to their close relationship not only with ritual activities but also with the control of surplus production—serve as a crucial window into

the evolution of early social power structures. Therefore, this paper takes the evolution of pottery wine vessels as a clue to explore their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early social complexity, thereby initiating a discussion on two theories: “competitive feasting” and “surplus and ritual.”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tegrate these two theories into a nested analytical model, using pottery wine vessels as a vehicle to reveal how economic surplus, ritual power, and competitive strategies jointly promoted early social complexity.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evolution of pottery wine vessels underwent a process from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to ritualization. By comparing these two theories, it also reveals that artifacts are not merely passive reflections of social relations but also active media through which social relations are constituted. The morphological and functional evolution of pottery wine vessels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accumulation of economic surplus, the operation of ritual power, and competitive feasting strategies, serving as an important material testimony to early social complexity.

Keywords

Pottery Wine Vessels, Competitive Feasting, Surplus and Ritual, Social Complexity, Integrated Analysis Framework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社会复杂化是指社会从一个简单的结构向复杂的结构进行演变的过程及其最终呈现状态，其包含两个基本维度：一是社会系统内部横向的功能分化，即构成系统的要素增多和相互关系变复杂；二是社会系统内部纵向的等级分化，通常与政治组织结构的层级化密切相关[1]。从整体研究脉络来看，早期社会复杂化研究早已脱离了单一追求普适性发展规律的阶段，转而聚焦于不同区域社会复杂化多元发展路径的深度解读。关于社会复杂化，尽管国际上已经形成了成熟的理论，但是国内学者也做了梳理与分析。例如，戴向明先生认为，早期复杂社会主要涵盖两方面内容：一是社会群体内部出现了制度化的不平等；二是社会群体之间也呈现出等级分化与主从关系[2]。然而，放眼全球不同区域的考古遗存与社会发展轨迹，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均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各自拥有独特的发展规律与内在运行逻辑，这也意味着现有的任何一种理论模型，都无法全面涵盖早期社会复杂化发展的全部内涵与复杂特征。在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物质遗存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观察视角，器物不仅成为了人类适应环境的产物，也是社会关系得以表达的重要媒介。其中，陶酒器不仅与仪式活动更与剩余产品的支配存在密切的关系，使其成为了窥见早期社会权力结构演变的一个重要窗口。

在国际与国内考古学界，依托器物遗存开展早期社会复杂化研究，已成为众多学者重点探索的研究方向。其中，Michael Dietler 提出的理论颇具代表性，他将宴饮活动视作社会权力运作的重要场域，认为社会精英阶层通过筹办高规格宴饮活动，来换取追随者的忠诚和支持，从而巩固现有的等级制度，也有个人或群体则通过举办极度奢华、铺张浪费的宴饮，超越对手，以争夺政治权力、社会声望和追随者[3]。但对比国际学界的研究成果，国内针对早期社会宴饮活动的系统性、整体性研究仍存在明显短板，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大量宴饮相关物质遗存，尚未得到系统地梳理、整合与深度解读。与此同时，“竞争性宴饮”与“剩余与仪式”两大理论在学术领域虽已得到广泛探讨与理论推演，但在实际考古研究中，将两种理论结合同一考古背景开展嵌套式实证分析的研究成果十分匮乏。现有相关研究大多存在一定局限性，

要么仅停留在对宴饮活动现象的简单梳理与表层描述，要么单纯聚焦于社会产品剩余产生的经济基础分析，很少针对核心问题展开进一步探究：一是社会生产剩余究竟通过何种路径，借助宴饮活动完成向社会权力的转化；二是在这一权力转化的完整流程中，作为核心物质载体的陶器，究竟发挥了怎样的功能与作用？

陶器的起源与人类的生计模式密切相关，是人类适应生存需求、改造食物利用方式的直接体现。在非洲地区，当地先民利用野生粟类、高粱熬煮粥食，从而使得该地区出现了最早的陶器，这种原始的炊煮方式后续逐渐演化成酿造谷芽酒的传统习俗；东亚地区的早期陶器，其功能则更多与水生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利用野生植物煮粥的行为紧密绑定[4]。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从陶器产生开始，它就已经深入地融入到了食物转化和资源再分配的社会进程中。值得注意的是，朱子成对红山文化东山嘴遗址的陶器分析表明，该地区已出现一定程度的陶器专业化生产与农户间经济相互依存。然而，社会地位的区分并非通过直接控制生产实现，而是体现为对交换网络中优质商品的优先获取权，由此形成了一种基于流通环节的等级差异[5]。王文静通过对凌家滩遗址大量陶器碎片的形态学与成分分析发现，该社会的陶器生产呈分散格局，但位于聚落等级最高处的中心社区能够获得种类更为丰富的陶器，反映出仪式活动的集中举办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经济流动的方向，使核心聚落得以通过仪式场域汇集并调配各类物资，从而催生出一种由仪式需求驱动的经济活力[6]。相较于玉器、青铜器这类生产门槛高、使用场景有限的器物，陶器不仅制作难度较低，更具有使用频率高、流通范围广的特点，且跨越了日常使用与仪式活动的边界，能够更真实、更细致地反映社会日常实践中的权力运作逻辑与资源分配模式。然而，梳理当前陶器研究的现状不难发现，现有成果多集中于器物类型学的描述与分类，对于器物本身、人类使用行为、社会制度三者之间的转化机制与内在关联，相关分析仍存在明显不足，这也成为当前早期社会研究中的一处重要空白。

基于此，本文将以陶酒器作为核心物质载体，尝试将“竞争性宴饮”与“剩余与仪式”两大理论进行整合，构建一个嵌套式分析模型，旨在揭示经济剩余的积累、仪式权力的运作与社会竞争策略三者如何相互作用、协同推动早期社会的复杂化进程，进而丰富并深化学界对早期社会复杂化理论的理解与认知。

2. 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陶酒器演变

我国酿酒与饮酒的传统由来已久、绵延不绝，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衍生出大量与酿酒、饮酒活动直接相关的陶器器物。这类陶酒器的功能与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逐步从满足日常饮食需求的实用器皿，向承载礼仪内涵的礼器方向演进，最终形成了一套相对固定、规范的器物组合体系。从发展脉络来看，陶酒器最初仅作为简易实用的饮器存在，随着社会发展逐渐走向精美化、标准化，其专用化水平与礼制化程度不断提升，最终成为宫城遗址与高等级墓葬中专属的随葬器物，成为等级与权力的重要象征。值得关注的是，在陶酒器的这一发展进程中，海岱地区与中原地区依托各自的文化特质，形成了两种风格迥异、各具特色的酒文化传统，成为早期区域文化差异的重要体现。中原地区流行集体啜饮的方式，体现了以集体为本位的文化取向[7]；而海岱地区则盛行“酿－盛－饮”的个体化饮用方式，更强调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关系[8]。

贾一凡对中原腹地龙山至二里岗文化时期随葬陶容器组合的研究显示，从龙山文化到二里岗文化，随葬陶容器组合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逻辑清晰的阶段性演变，其总体趋势是礼仪性和制度性的不断增强[7]。龙山时期，酒器组合开始出现，但尚未完全固定，常见鬯、壶与杯类器共存，组合相对简单、实用性强，可能与日常饮食观念相关；二里头文化早期属于过渡阶段，原有部分器形衰落或演变，新器形开始出现，组合处于变动之中；到二里岗文化时期，形成了相对固定和核心的酒器组合，其中，觚、爵的组合日益重要和普及[7]。尤其是在二里岗文化时期，陶觚常与陶爵配套出现，形成了具有等级标识和

礼仪程式的礼器组合，这体现了丧葬礼仪的制度化，也为后来商周青铜酒礼器的核心地位奠定了基础。

从陶酒器的发展轨迹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一个核心演变过程：其使用范围从最初的广泛普及，逐步收缩并被精英阶层所垄断，最终成为贵族阶层专属的器物。这一演变轨迹，无疑是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在物质层面最直观、最具体的体现。由此引发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核心问题：究竟是统治者主动刻意积累剩余粮食，将其用于酿酒活动，并借助大型宴饮仪式笼络追随者、强化自身权力，进而推动社会向复杂化方向发展？抑或是，早期的酿酒与饮酒活动，其核心功能在于服务祭祀、丧葬等各类仪式场景，而社会复杂化的推进，只是这一仪式化活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间接副产品？这引出了考古学界的两个重要理论解释：竞争性宴饮和剩余与仪式理论。本文不将“竞争性宴饮”与“剩余与仪式”理论视为非此即彼的对立面，而是尝试将二者进行整合，建立一个更复杂的整合性分析框架：以“剩余与仪式”理论作为社会复杂化的基础，为社会复杂化提供结构性基础，以“竞争性宴饮”理论作为社会复杂化的机制，为社会行动者在这一结构内部展开策略性博弈提供具体机制。而陶酒器作为物质遗存，恰好可以同时反映这两种逻辑，既体现了对剩余产品的支配，也参与了社会竞争与权力的产生。

3. “竞争性宴饮”与“剩余与仪式”：从对立解释到整合视角

持“竞争性宴饮”观点的学者认为，有野心的首领会刻意积累剩余粮食并用于酿酒，进而举办大型宴饮活动，从而获得忠心的追随者，巩固自身权力，推动社会不平等和政治集中化。国外学者 Michael Dietler 从考古学和人类学角度对酒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为，酒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深刻地嵌入在社会关系、权力结构、仪式实践和身份认同的创造与维持之中，在不对称的社会关系中，上位者通过宴饮向下位者展示慷慨，以换取忠诚和支持，从而巩固现有的等级制度，也有个人或群体则通过举办极度奢华、铺张浪费的宴饮，超越对手，以争夺政治权力、社会声望和追随者，这是社会等级产生和变革的关键动力之一[3]。麦戈文也将酿酒饮酒活动置于龙山文化的社会背景中加以研究，他指出，那些与大型房址、高等级墓葬共生的精美酒器并非日常实用器，饮酒是社会上层彰显社会地位的核心活动，他们通过控制这种技术复杂、原料稀缺的奢侈饮品的生产与分配，在宴饮中款待宾客、盟友或追随者，以此来炫耀财富、巩固权力、建立联盟和竞争社会地位，酒成为了社会上层用以显示其地位和权力的重要媒介，也是一种被刻意制造出来用于社会博弈的政治资本，宴饮则成为了竞争领导权和社会地位的一种手段[9]。刘莉团队对二里头贵族阶级酿酒饮酒活动的分析也发现，二里头宫殿区具有举行宴饮活动的功能，这类宴饮活动可用于展示上层人员的社会地位、财富和权力，或实现与各种社会群体结盟的目的，这种以酒饮为核心内容的贵族宴饮活动及其所强调的社会等级价值观念，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10]。因此，“竞争性宴饮”理论揭示了一条清晰的社会复杂化路径：酒作为一种高度可控的社会媒介，被上位者用于展示慷慨、笼络追随者、竞争领导权；而陶酒器作为酿酒、储酒、饮酒的物质载体，在这一过程中承担了不可替代的仪式与展示功能。通过对酒的生产与分配、宴饮的组织与呈现进行控制，精英阶层得以在部落内部制造并强化等级分化与主从关系，从而系统性地推动社会不平等与政治集中化进程。

而“剩余与仪式”派则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传统历史观出发，认为酿酒活动需要消耗大量粮食，只有在农业生产产生稳定剩余的前提下，才能支撑起这种非生产性活动。举办大型仪式和宴饮本身，就需要消耗大量的社会剩余产品，因此，对这些活动的控制，间接地意味着对社会剩余产品调动与再分配权力的掌控。这是一种通过“仪式性消费”来实现的经济控制。酒及其器皿最初主要用于祭祀，是社会复杂化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和仪式化的表征。严文明先生认为，史前时期酒器的出现说明当时已掌握酿酒技术，生产技术的发展使产品丰富起来，除满足最低限度的需求外还有少量剩余，这使得一部分人通过不等价交换或强行掠夺的方式榨取他人剩余劳动成为可能，这正是贫富分化乃至初步阶级分化出现的根本原因[11]。许宏先生也认为，以青铜礼器、玉礼器为代表的贵重物品的生产与分配，以及与之相关

的宫室建筑、祭祀宴飨等礼仪活动，在二里头早期国家的形成与维系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二里头文化最先进的青铜技术，并未首先用于制造生产工具或武器以直接增加物质剩余或进行武力征服，而是集中于铸造酒器礼器。这些礼器是祭祀、宴飨等礼仪活动的核心道具。他将二里头都邑描绘为一个庞大的“礼仪中心”，宏伟的宫庙建筑、规整的祭祀区、贵族墓葬中的礼器组合，共同构成了一个展示权力、凝聚认同、区分等级的仪式舞台。国家权力在这里首先表现为一种仪式性权力[12]。因此，“剩余与仪式”理论揭示了一条以经济剩余为基础、以仪式控制为手段的社会复杂化路径：酿酒与大型仪式活动需要消耗大量粮食，只有在农业生产产生稳定剩余的前提下才可能发生。精英阶层通过控制仪式的举办，间接掌握了社会剩余产品的调动与再分配权力，从而实现了对经济与政治资源的集中掌控。这一过程推动了部落内部从相对平等到制度化不平等的转变，为社会分层与国家雏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竞争性宴饮”和“剩余与仪式”这两种理论在解释逻辑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并且二者在解释过程中都存在各自的缺陷。“竞争性宴饮”理论以政治竞争为逻辑起点，将社会竞争视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认为剩余产品的积累本身就受到社会竞争需求的影响。在该理论视角下，有政治野心的首领为争夺权力、积累声望、笼络追随者，会主动有意识地积累剩余粮食，将其用于酿酒，并通过举办大型宴饮活动，实现对权力的巩固与扩张。由此可见，酿酒与宴饮成为服务权力竞争的核心工具与策略性手段，从而导致了社会不平等与政治集中化的直接后果。但该理论在解释区域差异时略显乏力，对于具备同样剩余生产能力的不同地区，衍生出了集体共饮和个人独饮的不同模式。相比之下，“剩余与仪式”理论则以经济剩余的积累与人类精神需求的满足为逻辑起点，着重强调农业生产所形成的稳定剩余，是酿酒活动与大型仪式开展的物质基础与前提条件。在这一理论认知中，祭祀、宴饮等各类仪式活动，被视为消耗剩余产品的主要社会场景与需求，精英阶层通过掌控仪式的举办权，间接掌握了剩余产品的再分配权力，进而逐步催生了制度化的社会不平等。但该理论对社会分化本身的起源也缺乏充分且深入的阐释，无法深入地解释为何剩余产品会首先被大规模投入到酿酒活动中，而非其他生产或生活用途。上述两种理论分别从不同维度揭示了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结构条件与行动策略，但又各自存在不同的缺陷。因此，研究的关键并非简单判定两种理论的孰是孰非，而在于将其置于具体的考古情境之中，深入考察二者如何相互嵌套、协同演变，共同推动早期社会向复杂化方向发展。

因此，应当在“剩余与仪式”所奠定的宏观经济与仪式结构中，将“竞争性宴饮”视为嵌入其中的具体行动策略。在早期社会发展进程中，祭祀活动不仅是一项重要的非生产性社会活动，更是集中消耗社会剩余产品的主要途径之一。稳定的农业剩余为大型祭祀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首领通过主持祭祀仪式，自然获得了对各类祭品的支配权与分配权，为首领集中与支配剩余粮食提供了合法性。在仪式结束之后，他再将原本奉献给神灵的贡品转化为个人的慷慨展示，以宴饮的形式分配给参与者。宴饮参与者在这一过程中直接感知到首领的威望与权力，从而形成对首领的忠诚与依附关系。由此，首领的声望与政治权力得以强化，完成了从神权合法性到个人政治权力的转化。二里头遗址便为这一认知提供了清晰且典型的考古实证：遗址内宏伟的宫庙建筑、布局规整的祭祀区域，以及贵族墓葬中成套的礼器组合，共同构建起一个兼具权力展示、群体认同凝聚与社会等级区分功能的仪式舞台[12]。在这一仪式舞台上，首领并未对剩余产品进行简单的平均分配，而是通过选择性宴请、提供专属特殊酒饮、使用精美陶酒器等差异化手段，制造出不同群体间的体验差异，进而在集体消费的场景中，清晰凸显自身的优越地位与核心权威。这种通过酒与酒器彰显权力的模式，在不同区域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海岱地区发现的“酿－盛－饮”一体化个体化陶酒器组合表明，饮者专属酒器的使用，本身就是个人社会声望与地位的直接物质表达[8]；而中原地区盛行的集体啜饮传统，虽更强调群体本位与集体认同，但主持宴饮活动的首领，通过对酒品供应与陶酒器使用的掌控，同样实现了对仪式过程的主导，彰显了其自身的组织权力与政治权

威[7]。两种区域传统在整合框架下，均可被理解为“剩余与仪式”基础上“竞争性宴饮”策略的差异化表现。

4. 结语

在中原地区陶酒器经历了从广泛使用到被精英阶层所垄断，集体啜饮的方式，也体现了以集体为本位的文化取向；在海岱地区则盛行“酿－盛－饮”的个体化饮用方式，更强调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关系。无论是共饮还是独饮，都让我们看到了陶酒器演变轨迹所勾勒出来的一条社会演进路径。在这一进程中，陶器不再只是盛放食物的容器，而是成为社会关系得以展开和固化的物质媒介，参与了宴饮活动的组织，介入了身份差异的建构，承载了权力再生产的逻辑。

“竞争性宴饮”认为，有野心的首领会刻意积累剩余粮食并用于酿酒，进而举办大型宴饮活动，从而获得忠心的追随者，巩固自身权力，宴饮成为了社会上层竞争领导权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手段，也推动了社会不平等和政治集中化。“剩余与仪式”则认为，酿酒活动需要消耗大量粮食，只有在农业生产产生稳定剩余的前提下，才能支撑起这种非生产性活动，因此，对这些活动的控制，间接地意味着对社会剩余产品调动与再分配权力的掌控，从而推动了部落内部从相对平等到制度化不平等的转变，为社会分层与国家雏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然而，二者并非相互排斥和非此即彼的，将二者并置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社会复杂化的动力既来自经济基础的积累，也来自政治策略的驱动；既受制于物质条件，也被文化逻辑所塑造。社会复杂化并非由单一动力驱动，而是在剩余生产－仪式权力－竞争策略三者之间形成循环，仪式活动为剩余产品的集中与再分配提供了合理的原因，竞争性宴饮则在这一框架内将物质资源转化为社会权力的象征，器物既是这一过程的结果，也是这一过程不断运转的媒介。

参考文献

- [1] Blanton, R.E., Kowalewski, S.A., Feinman, G. and Appel, J. (1981) *Ancient Mesoame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 戴向明. 中原地区早期复杂社会的形成与初步发展[J]. 考古学研究, 2012(00): 481-527.
- [3] Dietler, M. (2006) Alcohol: Anthropological/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5**, 229-249.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anthro.35.081705.123120>
- [4] 刘莉. 早期陶器、煮粥、酿酒与社会复杂化的发展[J]. 中原文物, 2017(2): 24-34.
- [5] Zhu, Z. and Li, T. (2026) Pottery Specialization and Household Interdependence in Hongshan Core Zone: Evidence from the Dongshanzui Site.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 **70**, Article 105641. <https://doi.org/10.1016/j.jasrep.2026.105641>
- [6] Wang, W., Wu, W., Yu, H. and Xu, W. (2024) What Lies Beyond Rituals? Exploring the Role of Pottery in the Chiefly Polities of Lingjiata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Asia*, **40**, Article 100557. <https://doi.org/10.1016/j.ara.2024.100557>
- [7] 贾一凡. 中原腹地龙山至二里岗文化时期随葬容器组合的演进[J]. 华夏考古, 2025(4): 86-101+112.
- [8] 向祎. 海岱地区史前陶酒器探析[J]. 中原文物, 2025(5): 68-76.
- [9] 麦戈文, 方辉, 栾丰实, 等. 山东日照市两城镇遗址龙山文化酒遗存的化学分析——兼谈酒在史前时期的文化意义[J]. 考古, 2005(3): 73-85+2.
- [10] 贺娅辉, 赵海涛, 刘莉, 等. 二里头贵族阶层酿酒与饮酒活动分析：来自陶器残留物的证据[J]. 中原文物, 2022(6): 30-44.
- [11] 严文明. 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J]. 文物, 1992(1): 40-49+25.
- [12] 许宏. 二里头：中国早期国家形成中的一个关键点[J]. 中原文化研究, 2015, 3(4): 52-57.